

“红头文件”不能“带病上岗”

赵志疆



今日论语

“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一律没收”……这些限定性极强的规定是贵州某县的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规范管理县辖区内所有城乡居民操办酒席的“红头文件”。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发布的“红头文件”随意任性,被网民吐槽。

“红头文件”多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严肃性。现实情况是,虽然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些“红头文件”自身却并不“规范”。遍览“问题文件”,大多

有以下几个特点:设定公民义务或剥夺公民权利无法定依据,违反行政处罚法擅自设定行政处罚内容,擅自设定行政审批事项或增加行政审批环节和条件……一言以蔽之,这些“问题文件”的内容随意而任性。

“红头文件”虽然不是立法资源,却也是必须考量成本与效率的行政资源,脱离实际的“奇葩文件”意味着行政资源浪费,违反法律法规的“法盲文件”则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侵犯。随意而任性的“红头文件”,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还是对法治社会的破坏。

“问题文件”屡见不鲜,值得追问的是监督审查机制。按照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

求,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要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首先应由法制机构进行把关,“问题文件”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因为审查不严。究其原因,相比起“红头文件”的数量,法制机构的人员往往捉襟见肘,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法制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很难对其形成有力的监督。

针对“红头文件”,法制机构应履行事前审查之职,人大则履行事后审查之责,相比起法制机构,人大监督不仅层次更高,而且效力更大。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人大监督政府“红头文件”是职责所系,敢于纠错纠偏,才能督促政

府依法行政。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2017年年底以前,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完成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另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在今后5年努力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全面清理“带病上岗”的“红头文件”,意义显而易见。

为确保“红头文件”科学规范,应公开决策过程以提请公众参与监督。消除行政神秘化已成为打造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红头文件”不仅应经得起法律的审查,还应经得起公众的监督。



新民随笔

让,还是不让?

邵宁

斑马线上转弯车辆不让行人,既不安全又不文明,是马路上一个顽症。尽管交通法规对此有明确规定,但能够自觉遵守的少而又少。今年1月23日,本报率先报道永兴路共和新路路口电子警察抓拍斑马线不让行人的违法行为,经查实后给予处罚。其他媒体也纷纷跟进,一时间消息传遍了网络:当心,斑马线不让行人要罚100元扣3分呢!

我发现,最近礼让行人的机动车明显多了。前几天,我在通过一个并不太长的路口时,竟有两辆车停下,让我先通过,这颇让作为行人的我扬眉吐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机动车和行人争道的“老大难”有所好转,上海驾驶员的素质提升不少,交警部门的这个办法,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过,在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也有开车族表示,有时候他停下来礼让行人,但行人也停下来了。这样让来让去,感觉到了“君子国”,不是耽误时间吗?那么,到底是让,还是不让?

我想起了去年全国两会时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作工作报告中引用的一个案例。浙江海盐的贝先生在开车时因为没有礼让行人,被交警发现并拦下,被处以罚款100元并扣3分。贝先生不服,之后申请了行政复议,又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最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支持交警大队的主张。这也是全国首例不服“斑马线之罚”的行政案件。

贝先生之所以感到“冤枉”,是认为他看到行人时是减速准备让行的,但行人主动停下来等候,他才把车开了过去。那么,他为何还是败诉呢?正如法学专家指出的,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其实是有选择的,行人的主动让行,其实是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因为与机动车较劲,很可能意味着受伤甚至受到生命威胁,行人的让,是因为害怕。因此,车辆与行人相遇时,驾驶员应当具备一种价值观,即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同时这也是对法律与规则的尊重。

而周强引用这起案例,目的是起到“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我相信,随着“礼让行人”成为一种风尚,也不会出现“你让我我让你”的情形了。

用善行为生活祈福

权威声音

“听说中国人在鸡年不喜欢生孩子,为什么?”近日参加一个春节招待会,有外国友人这样提问。生活中也时有听说“鸡年”“羊年”不宜生育、“寡妇年”“两头春”不宜婚嫁的说法。本来寓意美好的生肖和节气被用来“指挥”婚育,照见祈福文化的“迷信式消费”。

春节里到处可见祈福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景深:一方面,贴春联、挂福字、祭祭祖、拜神祇,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望;另一方面,一些不

合时宜的祈福仪式正逐渐淡出视野。祈求安泰,不少人不再燃放爆竹,而是选择旅游、健身等新年俗。祭祀祖先,许多家庭改烧纸焚香为敬献鲜花。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遗世独立,但文化传统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恰当地融入现代生活。

在文化学者眼中,“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由此便有了各种信仰崇拜和风俗讲究。祈福类的民俗活动本身并不都是迷信,但沉迷其中便可能产生幻想、导致迷信。现实中对新福文化的“迷信式消费”并不少见。生育婚配要“算八字”“看时辰”;为了行善消

灾,随意放生毒蛇猛兽;在文物古迹上抛撒钱币,图一个转运消灾……

人总是需要一些精神慰藉和理想指引的。但无论节日里的祈福表达还是地域性的纪念和祭祀活动,都应发乎真情实感、通达现代文明。我们传承祈福文化,应着重深掘传统底蕴、接通时代气息、培育现代气质。

在传统文化里,“福分”和“运道”的另一面,是“行好”和“积德”。祈福与圆梦之间,惟蹄疾步稳的奋行脚步不可或缺。檀香几炷也好,心香一瓣也罢,心存善念就是最好的护佑,砥砺善行就是最大的福运。(武伟珍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巨婴

易蓉

龙应台说做母亲应该学会的一件事是分离。当孩子呱呱坠地脐带被剪断的那一刻,母亲与孩子迎来生命的第一场分离。伴随孩子一天天成长,一步步走远,目送他们的背影,母爱要习惯分离。而对孩子来说呢?是否在“翅膀渐渐硬了”的时候,真的学会了独立,为离开而兴奋,可以真的说走就走?

“我们90%的爱与痛,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大多数成年人,心理水平是婴儿。”这是心理学家武志红新书《巨婴国》书封上的一句话,最近这本书登上亚马逊畅销排行榜。武志红在这本书里提到,刚出生的婴儿离不开母亲的照料,需要与母亲共生,同时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自己的就是正确,自己的需求必须满足,“共生”“全能自恋”和“偏执分裂”是婴儿的心理特点;而很多成年人与婴儿一样有这些心理特征,就是巨婴,巨婴无法脱离大家庭式的生活,自我极端。而当共生遇到全能自恋,又要在一起,又要无视对方的想法,希望一切“听我的”,巨婴们势必挣扎在“共生绞杀”之中。他用“巨婴理论”来解释了很多国人心理问题,比如:妈宝、催婚、愚孝、中国式好人等。

春节大概是考验共生的机会之一。武志红觉得回家过年是在追求一种“虚假的亲密”和“团结的假象”,千里的艰难迁徙是碍于大家长的权威压制。的确,代际、距离、环境等带来的观念、生活方式差异造成“相爱容易相处难”,7天的相处难免发生“相爱相杀”的情节。但我想相信驱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顾一切开始这场迁徙的动力应该还是家庭温暖的召唤,而这种召唤在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没能长大,巨婴也是有可爱之处的。或许在爱憎分明的任性里,巨婴也仍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份天真、单纯和对爱的渴望。而这些,即便带来一种牵绊,又何尝不是美好的?



断桥奇遇

近日,一种「恋爱保险」引发关注,该保险承诺若投保的两个人在三年后十年内结婚,可在婚礼上收到一万朵玫瑰。「恋爱保险」能保住爱情吗? 天呈画

自由谭

据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某高中老师,因批评学生上课带手机,被学生家长殴打致右耳膜穿孔;无独有偶,湖北省赤壁市某初中老师,批评了一名逃课去网吧的学生,结果学生离家出走,老师苦寻6天才将其找回……不知从何时开始,老师批评学生,一不小心便会变成“事故”,弄得老师心惊胆战,不敢批评学生。

提倡激励教育、赏识教育,重视和尊重作为独立个体的学生,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但如今矫枉过正,似乎连正常的批评教育也受到了“株连”,长此以往,娇生惯养、心理脆弱孩子就有被“捧杀”的可能。

老师之所以“怕”批评学生,其中,固然有老师的原因,而来自学生

家庭的不理解和苛求,不能不说是有目共睹的阻力。不是吗,今天的很多孩子自出生起就有六个长辈围着转,有的孩子不但习惯了对长辈呼来喝去,长辈还一副受宠若惊、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很受用”的模样。试想,这样的孩子面对老师的批评,怎能坦然接受?一遇批评,孩子往往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要么“揭竿而起”、离家出走,要么向家长“告状”发泄。碰到明事理的家长还好,知道老师管得严是要自家孩子“好”;若是遇见“熊孩子”背后的“熊大人”,一听孩子受了“委屈”,便火冒三丈,以为是老师故意找茬,要自己孩子“好看”:我都会

不得批评,你竟敢说三道四,那还了得?于是,兴师动众,问罪老师;或利用期末给老师填表打分“一票否决”的“杀手锏”,给予差评的“回报”,或干脆直接联名“上书弹劾”。如此这般,即便再有底气的老师也百口莫辩,不得不立马“失声”,识相闭嘴。

做老师是份良心活儿,有错不指,有偏不纠,最终受益的还是孩子。“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为人师表的老师,理应抱着“宁可让你恨‘一阵子’,不让你骂‘一辈子’”的宗旨,对犯错学生进行及时到位的批评教育,使其免走弯路。

孩子的教育需要学校、家庭和

社会的协同配合。老师批评学生,最需要的也是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最难的也是家长的理解和支持。老师不愿批评学生,说到底还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缺乏基本信任。家长和老师只有在孩子成长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教育方式上建立互信,才能步调一致,让孩子健康茁壮地成长。

批评教育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也是一门艺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努力研究这门艺术。虽然孩子最终受益与否要看其悟性,但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让自己的批评如三月里的小雨,沁入学生的心田,滋润学生的心灵,是应当追求的境界。

教育孩子家校应有共识

张高伟